

短論·觀察·隨筆

突破封鎖線之後的自由

——高華紀念

● 蘇 陽

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僅僅寫到1945年。在給這部鴻篇巨製作結的時候，作者輕輕地點到文革，惜墨如金地只用了幾十個字。他提到劉少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跟彭真、陸定一等幾位延安整風時期的迫害者一起，成了受迫害的對象^①。

其實，借助高華鍛打出來的一個個主題，讀者很容易續上紅太陽升起後三十年的中國情狀。以迫害和被迫害為例，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安排了一個叫古大存的幹部專門做代表發言。古大存的講話充滿激情，為此前延安整風中血腥的「審幹」和「搶救運動」大唱讚歌^②。然而，他自己在195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從廣東省省委書記變為「反黨集團」的頭目。整肅古大存和其他廣東幹部的總帥是陶鑄^③。而陶鑄本人在文革伊始，也就是古大存含冤而死的那一年(1966)，先是毛欽定的紅人身份調到中央領導文革，旋即被打為全國「最大的保皇派」，次年開始一直被拉着在北京的大會小會上遭批鬥，1969年在軟禁中死去^④。

迫害的對象當然不局限於高層人物，其深度和廣度往往觸目驚心。高華引用毛澤東本人的記載：1930年在江西蘇區，清洗運動在四萬多紅軍中查肅了四千四百餘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⑤。後來的延安整風當然不僅僅觸及思想。如果王實味被處決反映了整風慘烈的一面，那麼高華從薄一波的回憶錄挖掘出來的文字則可以顯示鎮壓的廣度^⑥：

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着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甚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訴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

這個暴烈的傳統，讀者也可以輕易看到它在1945年後的中國延續並且升級。據古大存的秘書楊立記載，1952年廣東土改複查查處廣東各級幹

部6,515名，佔幹部總數的5.2%。他們的罪名是「和平土改」。土改運動隨即轉向血腥暴力，「硬追硬逼，捆綁吊打」，據1953年統計，僅粵西地區一年自殺者便有1,165人^⑦。暴力傳統隨歷次運動升級：鎮反的濫殺，反右的擴大，後來是文革的種種極端行為（包括對地富家庭成員不分男女老幼的集體屠殺）。

通過書寫1945年以前的歷史，高華已經刻畫出毛治中國的靈魂和基因。對它的識別和刻畫，為我們認識1945年後的中國提供了鑰匙。雖然作者也對毛的性格，以及這些性格特質對歷史事件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紅太陽》不是又一本寫毛澤東的書。高華不僅僅寫出了毛澤東，更重要的是寫出了毛主義。一旦寫出了毛主義，1945年以後的政治歷史就不寫而寫了。這就是《紅太陽》的精彩之處和超人之處。換言之，如果說作為歷史學家的高華之外，還有一個藏在文字背後的「高華」值得我們去理解、去共鳴、去感念的話，那麼紀念高華的挑戰之一，就是讀懂作為政治社會學家的高華，讀懂他對毛主義的描摹，讀懂他對毛主義成因的探索。

一 修史求解釋

高華有名，其實他同時又容易被誤讀。一些常見的閱讀習慣，在讀者與高華之間設下迷霧。比如，《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刊登了一篇書評^⑧，曾引起高華本人關注。他在後來給《紅太陽》出版十周年寫說明的時候，還專門回應了這個署名遇資州寫的書評^⑨。遇在書評裏說，「沒有毛澤東，共產黨早就完了。『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酷、極左、陰謀，

其實相當必要。毛澤東不愧為真正的政治領袖，……從黨的生命和使命來看，毛搞整風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可謂歷史危難中的當仁不讓。說到殘酷，現世政治有過不殘酷的嗎？所謂『極左』，不左還算共產黨？」^⑩

這些評論裏反映出來的道德是非觀，以勝負功利為歷史評價的準繩，顯然跟高華以人道生命為準繩不同。這樣的分野不是學術問題，不值得爭論。但是除此之外，遇資州看似是有道理的這些話，在學理上也代表着至少三重迷霧。

第一重迷霧是把功過評判當做史學的主要目的。中國治史的一個傳統裏，事實為評判服務，所以評判作品水平高下的標準，是作品最後對人和事下的「定論」是否「公允」。這樣，一本寫毛的書，中心議題好像就應該是回答毛是否道德，是否偉大。雖然高華本人也在書裏嵌入了價值評判的主題，認為延安之路背離了民主、自由這些五四精神，但是主導他選擇材料和組織路徑的，不是評判，而是解釋。這一點筆者在下文詳議。

第二重迷霧是混淆了意識形態和手段。且不說無數左派政治力量其實



高華教授

反對暴力，更不消說左派意識形態裏的暴力主張一般是對外而非對內，就拿使用暴力的中共來說，暴力使用的強弱在不同時期有天壤之別。太陽是逐漸升起來的，暴力也是一步步變得更加廣泛，更加慘烈。遇資州所謂「現世政治沒有不殘酷」之說，無法解釋為甚麼1937年之前中共中央在遇到政策糾紛時，往往用民主討論的方式解決，也無法解釋為甚麼1976年之後，以暴力迫害為基本手段的群眾運動就逐漸消失了。

第三重迷霧是將非原則的暴力迫害混同於原則性的敵我鬥爭。毛主義政治迫害的特點是，受害人之所以被定性為「敵」，並不是依據原則，不是根據他們所支持的馬克思階級分析意義上的敵人，而是依據便利，依據當時權力鬥爭的派系而定。每一波運動的標準不同，同一次運動裏的標準也不停地在變。絕大多數被害人都是無辜的。

高華分析的獨特之處，不在於他對人和事的道義評判，如上文提到的他對民主、自由精神被遺棄的感慨；也不在於他對毛個人權謀策略的歸納，如所謂的毛的「兩面性」和「勢」、「道」、「術」。他的獨到之處在於他對毛的「升起」，以及與此相連的鬥爭文化的形成，提出了全新的、細緻的、多層次的解釋。

文革爆發的時候，也就是童年的高華開始思考社會問題的時候，毛的權力到了頂峰；鬥爭文化在中國更是肆虐到了頂點^①。文革開始幾個月內，毛就輕鬆地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從位子上踢下來；全國群眾完全在他神奇的魔棒下相互廝殺。

如何理解毛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呢？官修歷史提供的解釋是毛澤東的一貫正確，所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庸俗的社會學指向了國人的「封

建皇權」思想。陳腐的歷史學則是以毛的所謂「邪惡」的規模來解釋悲劇和荒唐的規模。高華的解釋則運用了相互融合的兩條進路：其一，毛的權勢是一步步建立起來的，是過程發生論；其二，毛的權勢之建立與另外一個社會現象——鬥爭文化——的建構相依相存，是社會變量關係論。

據高華記載，1937年劉少奇跟當時的中共中央存在極大的爭議，當時的首腦張聞天並沒有把他打成反黨的「敵人」，更談不上向基層群眾深挖甚麼份子。延安整風以前，政策討論和組織變動的基本模式，並非在精英和群眾當中同時開展以路線鬥爭為名目的運動^②。

鬥爭模式發萌於毛本人在江西蘇區搞的「AB團」鬥爭。1920年代末的這場運動起因於毛要打擊他的政治競爭者：贛西游擊區領導人李文林。這裏面既有政策之爭，也有權勢之爭。上文說到，「AB團」運動整肅了10%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很多人被處決。〈紅四軍前委通告〉和〈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中的話，對經歷過後來的運動的中國人來說是多麼熟悉：

贛西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③。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迹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④。

這種把權力爭奪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模式，在延安整風中逐漸完善並成為全黨政治生活的基本模式。到了1945年七大以後，這套基因就像裝完待用的計算機程序一樣融入了中共機體。難怪後來的運動，幾乎就是對過去的複製。也難怪上文提到的遇資州驚訝地寫道：「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使真相大白：原來『整風運動』與我經歷過的文革沒有甚麼兩樣。」^⑩這種驚訝，應該是很多讀者的普遍反應。造成這種驚訝不是偶然的，而是《紅太陽》的解釋力使然，是過程發生論的功效。

從社會變量的關係論來看，把毛的權力上升放在與鬥爭文化形成的關係裏分析，就避免了過份強調毛的個人因素——無論是他的能力、他的策略，還是他的道德。換言之，這提供了怎樣理解由個人因素通向權力頂峰的中間變量。

通常人們愛把毛主義裏面的個人崇拜理解為克里斯瑪型的權威，即權力來源於毛本人極大的魅力，以及群眾中存在的強烈的跟隨需要。《紅太陽》對毛的能力的肯定以及對其權謀的敘述，給這種理解以一定的支持。但是，我們同時可以讀到，毛從長征到整風，每一步都把個人的影響力做出兩種外在的安排：（一）在組織方面，他不斷把他得到的優勢轉化為黨的正式的組織規則（比如在黨內排名，三人制還是一人制等等），同時，通過懲罰異己和安插親信，給黨組織加上了非正式組織的維度；（二）在文化方面，毛逐步建設新傳統，通過劉少奇等親信推廣他的政策理念和理論基礎，壟斷對歷史的書寫，顯示唯有自己一貫正確。與之相配套，毛在基層培育了一套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的程序，並與政治迫害相結合使之更為

有效。如此，在高華的分析裏，毛的權威不是天賦的魅力，而是克里斯瑪、法理權威和傳統權威三者的組合。三者相互強化、共同增長的過程，就是「紅太陽升起」的過程。

二 內在的自由

對歷史背後理論問題的自覺，使高華有了馳騁的自由空間，避免了相關研究常見的一些誤區。高華的歷史書寫與眾不同，固然因為他的勤奮和才情，但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相對自由的心態——一種在無數限制和威脅下難得的自由心態。跟大多數當代史學者相比，他更能夠避開思維的陷阱，遠離精神的禁錮。

很多寫毛和毛時代的人，雖然也有勇氣突破禁區，拿起不被當局恩准的題目來做，但他們往往在突破封鎖線以後，仍然處於無形的束縛之中。那就是他們自己的思想對自己的束縛。

第一個誤區是以黨的長期宣傳形成的「公論」做研究靶子。他們所提出的所謂「學術問題」，往往是被宣傳攪迷了的偽問題。以文革研究為例，近年有一些學者醉心於探討周恩來、葉劍英等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文革中的行為，從而「發現」他們其實也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更有一些學者用功去索證林彪的品德。顯然，這些「學問」之所以表面上顯得有價值，完全是因為官修歷史中周恩來和葉劍英以高尚面目出現，以及林彪背負惡名。其實，共產黨的總理（周）和軍委副主席（葉）積極參與運動，或者一個被共產黨清除的人物（林）並不乏可取之處，無非是些常識而已。

第二個誤區是過於糾纏善惡的道德判斷，試圖用毛的惡，或者那個制

度的惡來解釋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的悲劇。這種取向，必然延續共產文化裏的敵我對立語言，妖魔化所要描述的對象，對妖魔化主題有利的材料不辨真偽、囫圇吞棗。例如有一本著名的寫毛澤東的書，居然用大批判時候編造的材料來「證明」中共官員有多壞。

第三個誤區是寫給大眾而不是給專家。大眾一般對問題的提出和求證都沒有很高的學術要求，這給低劣作品的生產提供了空間。造成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關歷史被官方凍結，因而使大眾有更廣泛的興趣；二是因為禁區的存在使得規範的著作寥寥無幾，導致沒有甚麼標準存在。

高華則不同。他沒有停留在對官修歷史的甄別上，沒有把歷史停留在一個個善惡的故事或者權謀智略的故事上。從這一角度看，高華是國內學者中能夠突破思維禁錮，提出有價值的研究問題的佼佼者。《紅太陽》等著述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顯得切入了問題的深處，完全得益於高華有意識地迴避官方話語系統所引發的問題。而且，他這樣做是完全自覺的。在《紅太陽》一書的〈前言〉裏，他這樣寫道：「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於對主流話語系統中有關整風運動的論斷展開辯駁，……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敘述和解釋。」^⑥所以在筆者看來，不以辯駁中共宣傳為研究目標，應該是高華獲得治學自由的秘密之一。這種研究旨趣，使得他提出了更加有意義的研究問題。

2008年，《中國研究書評》(*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發表一篇長文評述《紅太陽》一書。英文學術期刊登載長文評介一本用中文出版的書，這是罕見的。作者常成稱高書「無論在資料和分析方面都是歷史研究的傑出成就」^⑦。

社會學家傅高義(Ezra F. Vogel)這樣稱讚高華的工作：「高華善用迄今可獲得的資料，將史料的原始素材，如此完美地建構為學術表述。」在追思高華的時候，他稱高華的去世使「當代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失去一位最傑出的學者」^⑧。傅高義教授是研究毛時代中國歷史的先驅之一，早在1960年代就出版了影響深遠的巨著《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⑨。筆者就是在該書中第一次讀到上述有關陶鑄整肅古大存的廣東歷史。

另一位中國歷史研究大師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也對高華有極高的評價。他說，「作為一位有擔當的知識份子，他在著作中尋求理解毛時代中國的組織原則，包括他所成長的文革時期」；《紅太陽》一書是「客觀冷靜、實事求是的典範之作」^⑩。

三 限制下的人生

說到自由，不能不提高華所受的限制。筆者和他僅有一面之緣。對其著述背後的工作和生活，只是聽到很多傳說。其中一個故事，說的是他寫了《紅太陽》等作品後，他所在的大學處處刁難他，要處置他，他甚至有衣食之憂。適逢一個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即將訪問南京大學，一個愛慕高華才情的香港學者帶了高華的著作拜見了這個科學家。科學家後來在跟南大校長見面的時候，大誇南大優秀，在理科方面如何如何，在文科方面，專門說到高華的工作如何在國際上有影響。如此這般，高華在其所在單位的情形方才有所改善云云。故事的真實

程度無從探究，只是傳達了讀者對高華處境的許多關切。高華的工作離執政者的主旋律太遠，因此邊緣於他所在的制度和組織，並且面臨種種限制，不難想見^①。

筆者和高華短暫交往時的一個情景，長久地留在記憶中。2009年夏的一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熊景明老師請我們和高華一起吃飯，這是筆者第一次認識高華。他看上去令人驚奇地正常，一點不像是被診斷患有肝癌好幾年的人。江南儒生的白面，卻有粗密剛利的頭髮，在白面和頭髮之間，雙目炯然。說了名字以後，他說讀過筆者寫的一篇關於文革的文章，還誇了它。筆者想說些怎麼佩服《紅太陽》的立意、架構和寫法之類的話，又覺得那樣太俗太拍馬屁。問了他的健康和治療後，尋思着怎麼來問要問的問題。濡嚙之中，飯就吃完了。

香港中文大學建在崇山峻嶺之中。奇石險勢，深壑難關。我們這些來訪問小住的人有時候調侃說，這裏更適合打游擊而不是做學問。但這個安靜的、沒有煩擾的環境裏，不見得有無限的自由。至少走動起來特別不方便：無論從圖書館到餐廳，還是從住所到教室，都要「行山」，攀爬越級，氣喘吁吁。晚飯以後，夜幕降臨，路燈亮起來。香港的八月，悶熱得像蒸籠一樣。那天還似有似無地下着細雨。我們所住的雅禮賓館門前難得有一段平坦的路面，一二百米長短。高華就在這一小段平路上走路，來來回回，一遍又一遍。他笑笑對我說，「我這樣的身體，不能停下鍛煉。」

在繁華鬧市的盡頭，在癌症的陰影下，高華開闢了一小片自由的空間。此時他正在泰然自若地利用着、

享受着這一點點的自由。遠處有迷濛的海灣和迷濛的樓群，稍近處不時傳來高架橋上汽車的轟鳴。

註釋

①②⑤⑥⑪⑫⑬⑭⑮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643-44；639-40；17；530；647-57；87-90；13；15；xiii。

③⑦ 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頁224-67；130、143。

④ 鄭笑楓、舒玲：《陶鑄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頁301-42。

⑥⑩⑱ 遇資州：〈誰是「我們」及其「敵人」〉，《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8月號，頁143-46；144；143。

⑨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閱讀歷史，認識中國》而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懷念高華教授」紀念特輯，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⑰ David Cheng Chang, "Gao Hua, Hong taiyang shi zenyang shengqi de? (How Did the Red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5, no. 4 (2008): 515.

⑱⑲ 傅高義和周錫瑞的評價，參見www.21ccom.net/articles/rwcq/shzh/2012/0108_51653.html。

⑳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㉑ 著名當代中國史專家楊奎松教授對高華的難處提供過極大的幫助。高華去世後，楊對高的處境及其轉機有專門記述。參見楊奎松：〈悼念高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懷念高華教授」紀念特輯。

蘇 陽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系副教授